

运城文史资料

第三辑

(总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运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凤凰城的由来	张博文	(1)
史诚祖	裴 璞	(3)
自传略写	景梅九	(10)
景梅九简论（四、五、六）	赵瞻国	(12)
忆景梅九先生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评价		
事件的评价	李 苏	(65)
景梅九轶闻轶事四则	裴 璞	(69)
嘉康杰领导学生为灾民而斗争见闻	宋学璟	(71)
关于王善祥出走前后的一段回忆	席瑞卿	(77)
我和樊鸿泰在一起的时候	安 民	(79)
运城回民与伊斯兰教	介福平、王卫管	(84)
运城福音堂简史	刘文藻	(91)
福音医院始末	卫宾	(93)
谈谢克俭及其下场	宋学璟	(96)

凤凰城的由来

张博文整理

走进运城市区，常常会见到以“凤凰”命名的楼、馆，如“凤凰楼宾馆”、“凤凰电影院”等等，这是什么缘故？

原来，运城历史上曾经叫过“凤凰城”。

运城临近盐池，是盐运聚散之地，金朝末年，已被蒙古国占据，因连年战乱，盐业生产十分萧条。公元一二三三年，河东、陕西等处都转送任使司姚行简，绘制盐池图献给蒙古大汗窝阔台。当时蒙古正驱兵与金兵战于洛阳，军费拮据，上下犯愁，窝阔台一见盐池图，如获至宝，立刻下诏书让姚行简在盐池北畔的路村设立盐运使司，并命他专管盐税。从此以后，运城盐业又渐次复苏。相继还重修了池神庙、学宫，新建了钟楼、鼓楼、库房、馆舍，商贩云集，商业俱兴，一个小小村庄仅百余年间，就变成了庐舍鳞比、楼阁辉映、车水马龙、十分繁荣的小城镇。及至公元一二五六年（元至正丙申），已到了元朝末年，元顺帝整日与宫女们游宴歌舞，不理朝政，以致四方割据，兵乱岁饥，民不聊生。新任河东、陕西等处都转盐使司都河德俊，下车伊始，看到盐税虽然可取，而城内富户、官府、寺院居荒野，河南灾民又纷至沓来，一无山河天堑护卫，二无城池防守，难免生出事非。于是奏请顺帝，修筑城池。顺帝虽然十分看庸，但处于

多事之秋，生怕盐税有失，便破例即复：依议。

那海德俊奉旨修城，感到无尚荣光。虽然时值盛夏，他仍亲率府吏丈量、规划、迁移民舍，然后一面动员商民，广征丁夫，一面增派士卒二千五百余名，日夜督修。从八月开始动工，历时四个月，新城于年终告竣，名曰“凤凰城”。新城以“凤凰”为名，或因舜帝在此弹奏过熏风歌，取《尚书》“舜作箫九成，凤凰来仪”之意；或依古意，以为瑞应。想必是那海德俊希望他任职期间，瑞盐尽生，财阜日增，好为元帝效力吧！

“凤凰城”的城墙周长九里十三步，高二丈，池深七尺。城门五座，各筑城楼。每门侧筑土为台，高二丈，宽一丈八尺，长五丈，门内外左右都有守卫军士的住所。姚暹渠也改道北城墙外，为护城之池。当时除城门楼用砖砌之外，城墙全系土垒而成。现在东环城路上，还可以见到元时土城墙的遗迹。

“凤凰城”这个名字历时多久，历史上无从考证。据说后来因为运司驻扎，约定俗成为“运司城”，遂名“运城”，沿袭至今。其建城时间，历史记载不尽一致，有说是那海德俊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建，有说是他至正二十九年建。经查证核实，两种说法都不可信。从清代职官表上看，那海德俊至正年间在任，而至正二十九年元朝已被明灭，建城已不可能。据公元一三五七年三月，黄觉撰写的《筑城记》载，“凤凰城”当是公元一三五六年（元至正丙申）建，迄今已有六百三十年历史了。

史诚祖 运城盐业的古功臣 自学成才的新榜样

裴 璞 整理

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是牛年，闰四月，八月中旬已是九月半的气候了。当时我们运城市解州镇，不但天高气爽，桂子飘香，谷黍呈黄，棉花吐白，展现的是一派金秋景象；而且聚山西省三十六州府，一百零八县之风云，布政按察，五马黄堂，七品知县，在山西督抚大人的率领下都来了。大街桥如长龙，小巷马似流水，沸腾情形，前所未见！

解州镇为什么这样热闹呢？原来在这一年的六月，永乐皇帝分派要员，将全中国的郡县长吏进行了一次大考察，查出好、坏典型各一名。这里不叙述坏典型易州同知张腾入狱待斩；只说这全中国唯一的好典型，就是我们运城市解州人——史诚祖。

为了嘉奖史诚祖的“治行第一”，永乐皇帝向全国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同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酷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诚祖以厚老诚，尚共其职。持身励志，一於廉公。平赋均征，政清讼简，民心悦服，境内称

安。方古良吏，亦勿何让。特以汝行督学宁阳（即山东省嘉祥、鱼台、金乡三县）知州，仍兼山东（今山东阳东卫）县事。其益美乃明，慎终如始，以永之矣。并赐内臣一尊，织金纱衣一袭，倅千贯。钦哉！”

从这道诏文里，可以看见永乐皇帝对史诚祖不仅奖有加，不但授官，而且奖酒、奖衣、奖钱。看矛头，说不定哪一天永乐皇帝稍动金口银牙，史诚祖便会扶摇直上而为天官家宰了。所以当史诚祖载誉还乡探亲之日，全山西的主要官员，在督抚大人的号召下，与其说是庆贺，勿宁说是讨好朝廷，或者说是趋炎附势，反正是都大驾光临了，顿使解州蓬荜增辉！

要问史诚祖何如人也，他是怎样登上仕途，并取得这样大的荣誉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我们运城有这样一句方言：“羊马年广收田，但怕饥猴饿狗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恰巧就是老百姓犯色的猴年（戊申）。这一年已被连续起义的农民军敲响了卖钟的元朝政府，在长江以南又碰上朱元璋一军所向披靡，风扫残云。不只夺去了半壁江山，在南京城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而且派他手下第一员大将——徐达，统精兵数十万，直向北方打来。左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明军面前，已经失魂落魄的元朝政府，当然不等什么饥猴饿狗年了。

为了加强战备窃取运城盐池，元朝政府命令盐运使那海德俊在圣空镇（古运城）加高城墙。而且为了隐瞒前线的失败消息，除了封锁黄河以南的消息外，还把他们正在急修的战

备械，诗情画意地起名凤凰城（即今运城）。

屋漏偏遭遇阴雨，船破更遇打头风。元朝政府背运了烧开的水都糊钢底，这至正二十八年不但是猴年，而且还闰七月，十一月已是往年的腊月了。怒吼的西北风越过盐池，被中条山一挡又折了回来，在运城地区形成了狂恶的旋风，把正在赶筑的凤凰城工地上的沙土，卷起来又撂下去，撂下去又卷起来；古老盐镇如同塞外一般，风沙雨石，打得人前仆后继，面如刀割；而且修筑的是土城，不如砖石可垒，硬掘上来的土块子，又如同磐石一般，打不碎，夯不实。在不可抗拒的严寒面前，一般人都认为工程要暂时停止进行。

适得其反，穷凶极恶的元兵，不但把老夫役看管得如同囚犯一般，动辄鞭棒交加；而且绳困索绑，四乡抓人。在在劫难逃的情形下，运城盐行的一个小店员逃之夭夭了。

这个小店员就是史诚祖，他九岁丧父，因父亲是个穷秀才，跟父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十岁进盐行当店员，夏月天主人剖瓜引扇，他在厨房烧水煮饭，冬月天主人拥炉取暖，他在院里劈柴打炭。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史诚祖从不忘学习，一天只睡两个时辰的觉，通背了《诗经》、《左传》、《春秋》、《国语》及谷梁传、公羊传等书，并写成了一手好毛笔字。这至正二十八年，他虽然才十七岁，但由於会写善算，在盐行里已经是一个经常帮账的小先生了。他不只是为了逃避劳役，而且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接触的人比较多，隐隐约约地侦察到在我国的南方好像是出了什么对元朝政府不利的大事。为了寻求反元出路，他毅然绝然地向南方私奔而去。

史诚祖白天潜伏，晚间行动，先到平陆，后到芮城，再到风陵渡和吴王渡，皆因白天满岸官兵，晚间满岸是灯，处处被大兵把守，无法逾越。最后幸得天公作美，黄河结冰，他才从禹门渡以北的山谷间履冰而过。直至第二年三月，他才经陕北，到凤翔，投到明朝大将常遇春麾下，做了一名兀亲兵，深受常遇春器重，被提拔到幕府任事。可惜同年秋七月常遇春死于军，李文忠代常领军以后，以史诚祖年轻不负众望为由，仍拨诚祖入军为卒。诚祖对此怀揣不平，遂不告而别，又回到解州，仍去盐号管账。这时候徐达已克太原，冯胜、汤和已下怀庆、泽、潞等州，山西全部告平。

明军占领盐池以后，仅仅只是把凤凰城改名为运城，除此之外，盐业生产无变化，盐工生活无改善，在多次找地方官员未生效果后，史诚祖遂决计上南京找洪武皇帝。

好在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就在他的皇城门外设置了登闻鼓，敲鼓无人敢挡，闻鼓以后就有陛见的可能。史诚祖敲了登闻鼓以后，果然被朱元璋召见了。召见仪注无资料可查，只知史诚祖向洪武皇帝条陈的是：

（一）运城盐池是国之大宝，南北朝以后的北方国家的军费来源主要靠盐池。

（二）宋朝尤为重视盐池，曾派名臣包拯在运城任过盐运使。宋仁宗时曾采用范样的建议，实行“钞引法”，把官盐改为商运商销，于是销路大开，产量巨增。宋至道二年（996年）年产盐四千三百五十二万斤；天圣年间年产盐七千六百三十二万斤；到庆历年间年产盐已高达八千二百五十万斤。

（三）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原以游牧业为主，对其它极不

重视，元太祖听大臣别迭的话：“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亏颇有政治远见的耶律楚材极力向太祖建议：“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税……足以供给”。才改变了“悉空其人”的做法。但他们占领盐池以后，视盐池如牧场，强令盐工为其填沟铺路以供他们骑马横冲直撞，畦地多被践坏。他们把盐池收归国有，赶走原来的畦户，他们不懂盐业生产技术，又看不起汉人，致使隋唐以来，多年苦心经营的畦地荒废，盐业生产又倒退到“天然结晶，人工捞采”的原始阶段……。

朱元璋出身赤贫，因其从娘体脱胎时秤了九斤，故乳名重九，父母弃、兄嫂等，举家人被饿死，他本人当过和尚讨过饭，当过小兵打过战，对上层分子深恶痛绝，对平民百姓很重视，没等史诚祖把话讲完，他把玉带双手一提挂在胸口以上了。史诚祖哪里知道：朱洪武有个习惯，玉带提上胸膛就是高兴了，要提官，要嘉奖；玉带压下小腹就是动怒了，要逮捕、要杀头。史诚祖这时更不知朱元璋最近才下了一道求贤诏书，其原文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於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钦哉！”

朱元璋正在下诏求贤哩，万没想到这贤人不远千里而自己自来了。再一细看，史诚祖一身布衣，风尘仆仆，正与当年的“重九”相似，既爱其才，又有同病相怜之感。于是龙

颤大喜，遂侧面问宰相胡惟庸道：“哪里有缺员？”胡惟庸深知皇上此时此刻的心情，随口答道：“山东汶上的县令不是坏事了吗！”朱元璋似有所悟地大笑道：“史诚祖，运城盐池之事，寡人今后自当重视，今特擢尔为山东汶上县令，期其夙夜不懈，勿负朕意”……。自此，史诚祖跻身仕途，当了知县。

由于朱元璋听了史诚祖的建议，所以，有明一代，很重视运城盐池，使运城盐池得到了空前的兴盛。明朝对运城盐池的主要措施有五：

（一）改变管理形式。洪武二年（1369年）听史诚祖的建议，立即派遣了“河东郡转运使司”专管河东盐务。为了便于领导，把盐池分为中、东、西三场，盐池仍归大明王朝所有。劳力先是征集，到明中叶又鼓励商人自备工本到池内直接开采，所产之盐按官七商三分账。雇用盐丁，每捞盐一料（二十万斤）给银二十两。嘉靖、隆庆年间又增为每捞盐一料，允许另捞盐一百引（每引二百斤）作为雇工的工本。这种官商并举的治盐策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二）减轻盐税。明初每引盐课税二钱一分至三钱二分，洪武年间一年收盐税二万四千多两，比元末每引课钞三锭，一年收盐利三十九万万五千多锭，真有天壤之别，于是不少商人争相投资盐池。

（三）恢复唐宋以来垦畦浇晒的先进生产技术。平时筑畦蓄水，培养盐方，蒸盐后集中捞采，精心护管，这种“以种且抽”的办法，初步摆脱了完全依靠大自然的被动局面，使潞盐的产量稳步增长，质量显著提高，销路广增。

（四）改革销售和征税办法，因时而异曾有过数次变

革。大体上是：成化以前主要实行“开中法”，成化以后主要实行交商专办，按引派课，征收银两。所谓“开中法”是仿照宋朝的“折中法”而实行的，即求中盐，纳马中盐，纳铁中盐。因在成化以前，战争较多，需用大批的食粮、马匹和钢铁，而且战场多在边远地区，运输诸多不便，实行开中法，就是让商人纳这些东西送到指定地点，换取等价的盐票，然后凭盐票到河东领取相当数量的盐，即可自由销售，这样既推销了食盐，又掌握了必要的军用物资，还省去了转运的麻烦。至于商人则就地购货，避昂取廉，“销盐中又取消了多层次盘剥，从中也得了实惠，于国于商互为有利。

(五) 加强防范，严禁走私。成化九年(1473年)朝廷派“巡盐御史”一员，巡视河东，并对贩运私盐者处以重刑。成化十年把盐池周围土地改收为国有，征调民夫修筑禁墙，共筑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丈，南北墙高一丈三尺，东西各高一丈，基厚一丈三尺。禁墙之外有马道，马道之外又挖“隍堑”，储蓄野水为护墙河。正德十二年(1517年)又调民夫三万，用半年时间把禁墙加厚至一丈五尺，加高至二丈以上，隍堑加宽至一丈五尺，并开中、东、西三个禁门，禁墙之内分六十铺，派重兵把守。

通过以上措施，运城的盐产量大增。公元1504年竟高达二亿八千八百多万斤，创有史以来最高峰。

除此之外，明朝还把凤凰土城加高加厚，改成砖城，並改名为“运城”。

语有之矣，“读其书想见其人”。史诚祖由微薄而显达者，实为今后自学而向上者鉴。

自传略写

(一九五二年三月)

景梅九

景梅九，名定成，以字行山西安邑县人，家贫幼受业于同邑景汉卿师，七岁入塾，十一岁通五经，十三岁游庠。早婚十六岁，生子十八岁，生女十九岁，入太原令德堂。时值庚子之变，同学多避散，我仍留居太原。旋考入山西大学堂西斋（即今德堂后身），又蒙选送入北京大学堂，廿岁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予科。毕业返国时，已加入孙中山先生手创同盟会，充山西分会评议部长。廿八岁经陕西牛勿幕同志介绍，来陕充高等学校数学教员。三十岁即辛亥年，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于所谓前清辇毂之下倡导革命。武昌起义即开道入晋，协助山西独立义举，充山西军政府政治部长。清师入娘子关，山西都督阎锡山率师北走，我随一部分义军南下。共和告成，充山西稽勋局局长，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仍主办国风日报于北平，因攻击袁世凯被封，议院同时亦被解散。我偕眷入陕，避地三原，密联同志讨袁。乙卯年，三十四岁，重返长安。冬被袁氏侦探告密，由陕解送入北平军狱。三十五岁袁逆死，始获出狱，重振国风。中经张勋复辟，曹氏贿选，段氏专政。三十九岁协助中央革命。四十岁

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国是。不幸中山先生与胡笠僧同志相继逝世，我遂流转南北避闻锡山之密网。四十八岁、四十九岁，在江西游庐山避暑，起草红楼梦真谛。五十岁返故里，五十一岁主编安邑县县志。五十二岁重游西安。五十五岁，双十二事变起，我号召同志，组织西安国民党临时党部，宣传中山总理联俄、容共、劳工三大政策。目蒋派为国民党叛徒。重振国风于西京。暨张扬两同志被囚禁之后，蒋氏食言，国风遭忌，曾被罚停刊。中间我曾充商专国文教员，及国学社讲师。五十八岁得扁枯疾，六十岁少愈。六十六岁因反对阎锡山入南京请愿，乃知蒋闻通气，始加入民革，充第一届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本拟入粤，因内子玉奇病笃，电召返陕。此后即被蒋之特务监视。解放军兴，国风自动停刊，因经费人事均感困难。两年未在寓整理旧稿，虽蒙李副主席电召入京，但因病迄未成行。在陕恭充民主人士，毫无贡献，实深惭愧。去岁（一九五一年）十月，自行申请参观天水土改，自喜躬逢空前盛会，得以深入民间。偕老壮同志二十四人，由西安出发，于十月十日到达天水，分组参观。我随众赴藉口乡参观月余，共得纪行俚句廿五首，画出土改轮廓，已另纸誊清，交统战部存查，不再赘。今志愿参加西北历史文物研究会，继续为人民服务。

景梅九简论

赵瞻国 整理

四、景梅九的社会经济地位

景梅九不富钱财，也不善理财。严格说，他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经济思想。但是，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为了从根本上揭示他的恩怨观点和政治立场的渊源，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他在当时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他的经济方面的思想认识和活动情况。

(一)、清季运城地区经济状况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人们来到社会上，只能在既定的经济关系中，在社会所达到的现实经济条件下，开始自己的生产劳动和其它生活。因此，在说明景梅九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前，需要先考察一下景梅九生活的时代，特别是他的青少年时期，家乡安邑以及运城一带的社会经济状况。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直到清季，这种状况仍未根本改观。因此，先看农业状况。

运城地处黄河、汾河三角地带，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相传教民稼穡的后稷，便在今运城地区的稷山一带活动，这里自古有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据中华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所纂的《解云志·物产》记载，清季以来，

运城一带农村经济，除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桑蚕与棉花。

华美的丝绸，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奉献。时至今日，通往欧·非的“丝绸之路”，仍令各国友人向往。种桑养蚕巢丝，在运城一带的历史上曾有过重大发展。运城西南二十余里有一村名“蚕坊”，是一例证。后来随着棉花等作物的引进与发展，渐“率失本业，桑枯无存，市亦鲜售丝者。”（113）清光绪三年运城一带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光绪四年才有降雨，旱象稍缓。光绪五、六年（公元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即景海九出生前二三年），清政府为振兴地利，发展经济，重沂提倡栽桑。当时解州全州（大致包括今运城、夏县、临猗等市、县），植桑树数十万株，促进了蚕丝业发展。当时的缫丝纺织，都是手工操作，在庙会集市上出售。《解县志》记载：“妇女勤者，饲蚕作茧，取丝成帛，朴素无花（华）。六月二十三日关帝庙会，贸易成市”。可见当时的兴盛景象。随之在清朝末年，出现巢丝纺织作坊。民国之后，各县设农桑局，管理桑蚕事业。解县城内的丝织作坊也增加到三四家，以后随着外国“洋布”等纺织品的涌入，农村蚕丝业遭受排挤，很快衰落下去。

棉花，在民国初年，运城一带农村还称之为木棉。运城气候适中土，质疏松，所产棉花绒细而长，品级高，历史上有植棉习惯，曾一度取代桑蚕业。但据《解县志》记载：“五十年前，人稠工贱，一尺之布仅值制钱二十余文，尔时犹未多种棉也。统计吾解之地，种棉者不过百分之一二。今则则三分之一种棉矣。而花价腾贵，布机如稠。其何故也？良以风气

大开，铁路轮船交通便易，远商云集，购运各省，故货愈多，而价愈昂。不比以前闭关时代也”。《解县志》修于一九二〇年，“五十年前”，即一八七〇年前后。那时这里棉花生产量不大，后随着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在各大中城市开设棉纺织厂，在外国资本刺激下，民族资本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其中有的也开棉纺织厂。这样棉花销路大开，花价上升，刺激棉花生产大幅度增加。外省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商人，前来运城一带大批量收购棉花。当时已有人提出，在运城当地开设纺织厂，就地加工取利。

以上情况表明，景梅九出生前后，由于海关大开，外国资本纷纷涌入，在政治压迫同时，更加紧经济剥削。在此影响下，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刺激正在萌芽中的我国民族资本有了较大发展，正波及影响到运城一带城乡经济。例如，刺激棉花生产长足发展。另一种是又压制、扼杀了我国传统农业经济与民族经济，使之濒于破产。使我国城乡经济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沦为原材料供应地，更深陷入殖民地经济。例如，蚕桑业便遭受重大挫折。棉花大幅度增加生产，其实也只是外国资本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总之，清朝中后期，运城一隅城乡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已开始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活动中去，在农村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同时又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沉重压制。

再看手工业。

运城地区的手工业开化比较早。据中条山考古资料，在二千年前的东汉，运城劳动人民便掌握了开凿矿洞和冶炼黄铜的进步方法。铸造、纺织、酿造等手工业，在历史上也不断

发展。明、清时代，运城盐池出现职业性学校。民国前后，职业学校教授现代新科学技术。据旧县志记载，解县、临晋等县，把当地出产的煤、木、白垩送往太原化验，以开发利用，等等。

下面是商业状况。

当时运城潞盐行销河南、陕西、内蒙等省区，因而运城以及安邑、解州的盐运商业比较发达，行销地广路远，城内店铺多，另外还有一些与盐业有关的服务性行业。这是安邑，特别是运城这座“盐城”的商业特点。清修《安邑运城志》载：“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几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产物”。记述有些夸张，不过还可以看出运城作为晋南的经济中心，有比较发展的商业。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依靠集市贸易。在志书中都列有集市情况，有的称为庙会，场集等。《河东盐法备览》称：运城有场集，“场为商民所错处，集则粮食所聚之场”。表明集市按售货者与交易货物的不同而有所划分。《安邑运城志》还记载，当时运城集市有官方制定公布的“约法八条”，对立集时间、地点、买卖方法、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这说明当时政府对集市是实行一定管理的。总之，运城一带的商业，从历史上看不太发达，主要途径是集市贸易。这是与不发展的商品生产相联系的。

最后考查一下工业。

严格说，运城在近、现代没有工业，基本上是手工业。抗战胜利之前，运城连一台车床也没有。据《运城市工业简志》（1984年8月）提供的材料，抗战前，运城城内共列出二十一项，九十五家，工人、职员、学徒共四千零四十一名，生